

吳主席講演稿存

第二冊

中國政治的哲學根據

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保甲訓練幹部講習所紀念週訓詞

JD  
3542  
2666-3  
2

政治的意義，中西學者下的定義很多。本人就從政的經驗得到的理論，認為政治是對人的學問。就縱的方面說，政治是管理人的；就橫的方面說，政治是應付人的。因為政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那麼，人與人之間，必定要有一個原則來支配它，這個原則，就是仁字。因此，政治可說就是仁學。

從仁字的字義講，是二人爲仁。古人說：「仁者人也，親親爲大；義者宜也，尊賢爲大，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」，由此得到仁字又一解釋，即所謂「仁者人也」。因爲人生到社會上，即不是一個人，必須有應付人的道理，這個道理的出發點，就是愛人，便是所謂「仁」。

中國古書中，講到仁字的很多，儒家人生哲學的中心思想是一個仁字。孔子所講的仁字的內容，包含兩方面，即所謂忠恕。就積極方面說：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」即所謂忠；就消極方面說：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即所謂恕。由此不但知道仁的本體，而且可知道仁的方法，就是仁的本體在愛人，而仁的方法則在推己及人。這種態度應用到政治上，便成一個敬字，所謂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」，而孔子所說實行仁的方法，即所謂：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矣」。他的意思是說，仁的起點是在親親，即上面所說：「仁者人也，親親爲大」。又如孟子說：「仁之實，事親是也」，莊子也說：「虎狼仁也……父子相親，何爲不仁？」孟子更把這種思想應用到政治上，便成了所謂「仁政」或「王

政」。仁政的出發點是惻隱之心，亦即所謂不忍人之心，如孟子說：「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，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諸掌上」。仁政的目的是要「不違農時」，使人民「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蓄妻子」；實行種這仁政的方法，就是所謂推恩（即推愛），如孟子說：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運於掌」。又說：「善推恩，足以保四海；不推恩，無以及妻子，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，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爲而已矣」。由此足見孟子的政治思想，亦是建築在仁字上，所謂推恩的道理，也是從忠恕二字引申出來，而且因爲注重推恩，遂發生愛的差等。至於大學上所講的絜矩之道，所謂：「所惡於上，無以使下；所惡於後，毋以從前；所惡於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惡於前，毋以加於左；所惡於右，毋以加於左；所惡於後，所惡於後，毋以從前」。

左，毋以交於右，此之謂絜矩之道」。也不外發揮推字意義和忠恕的道理。

我們知道，人既然與人相處，他的範圍儘管有廣狹之不同，但均有一出發點，即是愛人。所謂人也者，其思想行為不是單純的，偶然的——一方面是過去無數代歷史上的典章制度所造成，一方面是現在既成事實所影響，另一方面又受將來的新潮流新理想所誘導。因此一個人，要受過去的史實，現在的環境和將來的理想種種影響。所以，各時代有各時代的人，各地方有各地方的人，不過儘管他們有這種種不同，可是支配人的，還是祇有一個共同的道理，即所謂愛人，亦即所謂仁學。

但所謂「愛人」有不同的兩類，一為博愛主義，愛無差等，如耶穌教，佛教及墨家所主張的愛；二為推愛主義，愛

有差等，由近及遠，由親及疏。這是中國文化和西洋文化根本不同之點。單就理論講，自然是博愛主義好，不過這不是一律合人情、合事實的。中國的推愛主義，完全是根據事實立言，如所謂：「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者」。完全是從人類的本性出發，絲毫沒有矯飾。由愛自己的父母，推而愛他人的父母；由愛自己的子女，推而愛他人的子女，並且愛自己的父母子女，甚於愛他人的父母子女，所謂親親之殺，這是十二萬分合於情理的事，實行起來，也是不待勉強的。

西洋人因為主張博愛，所以不講推愛，不講差等，個人之上只有國家，只有一個抽象的對象，除愛自己之外，人人都愛，而實際上的流弊有時等於人人都不愛。因為人的本性，愛己終甚於愛人，那麼，博愛的結果，必偏於個人主義，家人父子可以不顧。講到中國的推愛，則沒有這樣流弊——推愛

是以愛親爲出發點，因此中國人認「孝」爲愛人之始，極講究孝道。古人以「孝爲百行之先」，又以「孝治天下」，一部孝經，對孝的道理講得極完備，極透澈，一切理論都包括在孝裏面。所謂孝即：「生事之以禮，死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，孝之始也；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，孝之終也。夫孝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」。大雅云：「無念爾祖，聿修厥德；此之謂也」。推其極，則所謂：「事君不忠非孝也。戰陣無勇，非孝也。」（古書中所謂「君」字，在民國政體時代當然作「國」字解，不可拘泥誤會）兵役法不徵獨子，也是根據中國孝親的道理。

講到推愛和愛有差等是合乎人情，而博愛和愛無差等不合乎人情一節，可以再舉一個例來證明，從前有一個極講究理學的名人，他的姪子生病，他在夜裏起來三次去看他的姪

子，後來他自己的兒子生病，他沒有起來看過一次。這樣，他愛兄之子，似乎甚過愛他的兒子，可是實際不然，他自己記載上說的是：他雖然看了他的姪子三次，很關切，但他每次看了以後，便安然熟睡，而對他的兒子雖則沒看一次，可是他終夜不能成眠，由此，可見愛自己的兒子，始終甚於愛他人之子，也可見愛有差等，完全是根據人情，根據事實立論，也是最合乎情理的了。至於中國的五倫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，也就是愛的差等來分的。

中國儒家的推愛學說，在當時便有楊墨的學說和他對立，到魏晉時代，楊朱的學說盛行，個人放任主義和利己主義，盛極一時，因此儒家推愛的學說受到了阻礙，政治上也發生了極大的混亂，同時黃老之學在這時也十分猖獗，在政治上主張無爲而治，反對一切道德仁義，文物制度，甚至於思

想知識。如老子說：「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爲盜；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；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智，強其骨，常使民無智無欲，使乎知者不敢爲也，爲無爲，則無不治」。又說：「絕仁去義，民復孝慈；絕聖去智，民利百倍；絕巧去利，盜賊無有」。中國這兩千年來的政治，實際上受黃老學說支配的影響不少，因此不但在民生方面，政治方面沒有長足的進步，甚至連儒家因革損益的思想也根本取銷，歷代君主祇知道保守祖宗基業，一般政治家，也大都抱着清淨無爲的態度，甚至一個守令，也想做到每日飲酒高臥，無案牘之勞形，這樣，政治怎會有進步？民生怎樣能解決？到了近百年來，除開黃老學說外，又來了博愛的學說。於是大家都研究實際，徒好新奇，去接受種種不合人情的空洞的道理。家庭不要了，孝道也

不講了，愛的出發點根本去掉，愛人的道理也就無從講起了，於是個人主義的洪流，便氾濫到中國來。像我們在四十歲以上的人，大概不免受黃老學說的影響，而在青年人雖不會受到這種影響，而對博愛的思想很容易接受，於是個人主義的流毒，也不免傳到青年的身上來。

外國文學的「國」字，在中國文字可用「國家」兩字代表，就是因為家在中國的社會中，不僅成了一種必不可少的因素，而且在理論上也有他的根據，牠是愛的擴張的一個階段，牠是構成社會的基礎，在實際上，在理論上，都是合乎人情的，都是以人性為出發的。牠在個人與國家中間是一種必要的聯繫，是充實國家組織的要素，是一種最合理的組織。

其次，仁愛雖然是政治的基本原則，可是單講仁愛，不免要發生流弊，歷史上有所謂大義滅親的事實，如左傳上所

記衛州吁弑其君，石錯不僅惡州吁而且把他自己的兒子也殺掉，如果專講仁愛，那就不得不免有徇情枉法的流弊，所以單獨講一個仁字還不夠，不得不加一個義字上去，補救他的缺點。就義字的字義講，所謂義者宜也，義的意義便是合理也，就是所謂正正當當的行為。義是用來補救仁愛的缺點的，例如普通講忠孝，所以把忠國加在孝親之上，這便是由義的道理推出來的。又如中國講五倫把君臣放在父子之上，也是同樣的道理。普通所謂忠孝不能兩全，意思是要爲忠而犧牲孝，也就是爲義而犧牲仁，把忠義加在仁愛之上，這是中國仁愛學說的一大進步，也就是證明中國古代學說，把國家看得比家庭和個人還要重要的證據。由此知道，中國講仁愛，並不限於家庭而止，愛國比愛親還要重視，不過他的方法是重在一個推字，這是和西洋博愛主義，最大不同之點。由此我

們可以說推愛是政治的基礎，博愛是政治的目的。

我國儒家的推愛學說，因爲在早期受了黃老學說的阻礙，所以歷代聖君賢相，雖有仁心仁政而民不被其澤。到了近代又受西洋博愛主義愛無差等思想的流毒，漸漸造成個人主義，因此政治上及其他各方面又受了很大的影響，學說紛紜莫衷一是，真難乎其爲人了。我們明白了這種道理，再來講一講做公務員應守的原則。

第一，要做一個現代的公務員，應該國而忘家，公而忘私。在這裏應該注意的是這一個忘字：並不是說不要家，不要私。只是在執行國家職務的時候，應該忘記家庭和個人的利益，這就是古人把忠字放在孝字上的道理。也就是所謂義字的道理。這是積極的政治原則。

第二，要做一個現代的公務員，應該家不誤國，私不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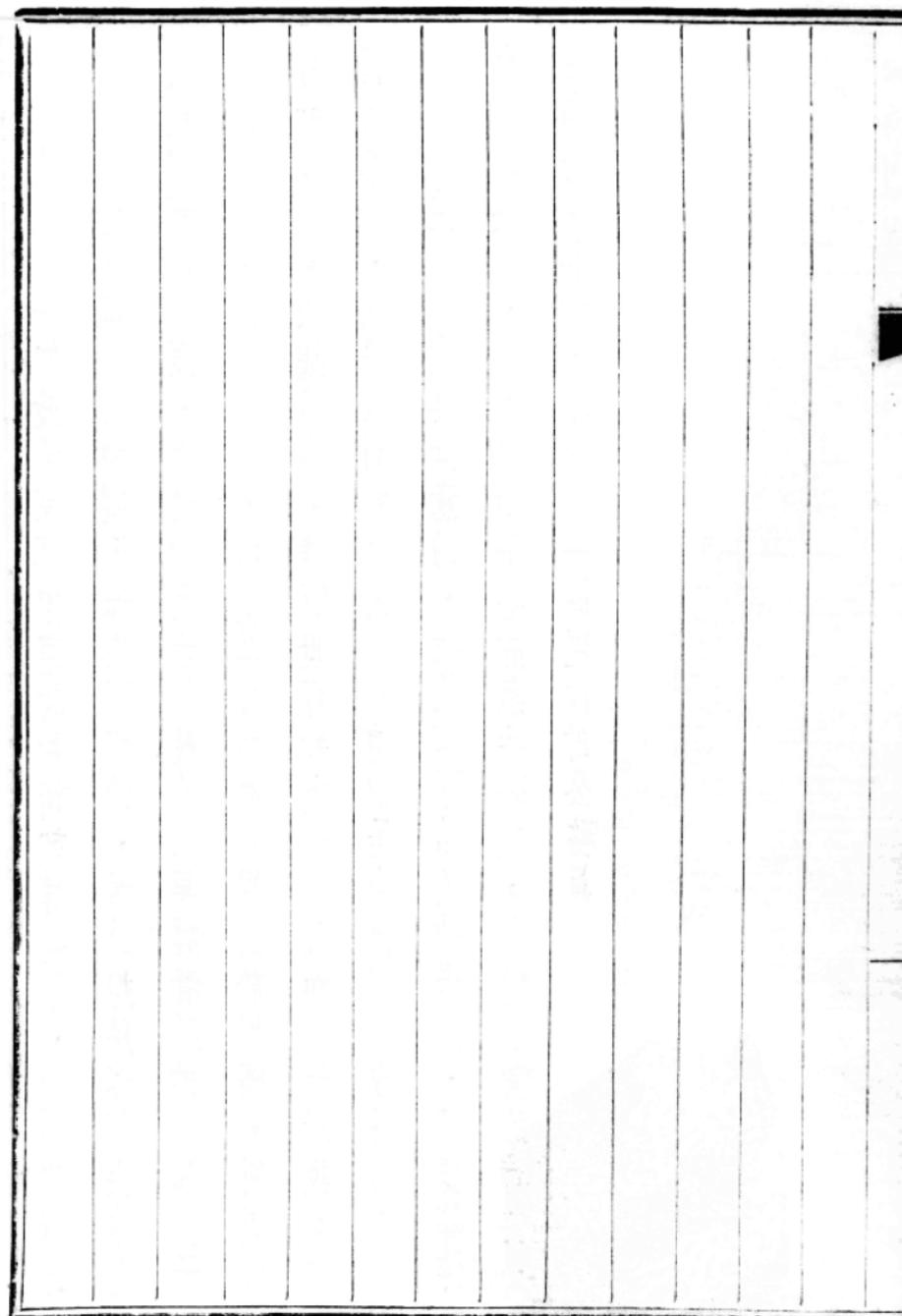
公。要顧到人情，自然不能不順人的本性，人類愛己愛家的心理，是誰也不能否認。要緊的是不可爲了家而誤國，爲了私而害公。反轉來說，能夠同時爲家爲國，同時顧到私也顧到公，也無不可，不過如果二者不能兼顧時，那便只好犧牲家庭來保全國家的利益，犧牲個人來爭取公衆的福利。總而言之，愛人是政治的起點，推愛是愛人的次序，而博愛是最後的目的。

此外應該注意的還有兩事：

第一，一個政治家，不但要溫故還要知新。新舊應該兼收並蓄，我們祖宗遺留下來的文物制度，如果是好的，我們自然要發揚光大，而西洋新的東西，如果適合國情，我們也應當酌量採取。我們的意思總不要偏執，一方面要保存固有的精華，一方面也要接受新的思想。

第二，一個政治家不但溫故知新就算完了，進一步還要能夠除舊佈新。舊的制度如果不好的，應該想法逐漸去掉它而代以新的制度，這是我們古代政治家早經看到的。如孔子所說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」。又如孟子所說：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」。這都是除舊佈新的證明。

最後，我們要注意的，我們有了治人的學問，還要等待治人的機會，所以必須平心靜氣去研究，應付事情的時候，更須心氣和平，才配做一個現代的公務員。



## 根本的縣政

二十七年八月七日在保甲訓練幹部講習所紀念週訓詞

抗戰時期應該注意的縣政工作已經講過了。至於通常時期根本的縣政工作雖千頭萬緒，然總其要，不外教養二者。換言之，縣政的根本工作，不外物質建設和文化建設。

一般對縣政的物質建設有三種錯誤的觀念：

第一，是認市政爲縣政，就是把市政的設施應用於縣政。如柏油馬路，自來水，電燈及一切所謂近代都市設備的事業，都想舉辦。這不是縣地方物質建設的根本工作，也非一般縣區都能做到的。這是第一種錯誤。

第二，是認全國的集中事業或省政範圍內的集中事業爲一縣的事業。就是把全國或全省舉辦的物質建設事業，都想拿在一縣來舉辦，這不但非縣所能舉辦，也是爲法令所不許。

的，這是第一種錯誤。

第三，是認特殊縣份爲一般縣份，就是想把特殊縣份所能舉辦的事業拿到一般縣來實施，例如貴陽遵義安順等大縣所能舉辦的事業，一般縣份不一定能舉辦，這是第三種錯誤。

我們把這幾種錯誤觀念除去，自然就可認清根本的一般縣政是什麼。

就物質建設來說，在我國古書上可以找出一個標準來。就是孟子所說的：「入其疆，土地闢，田野治，養老尊賢，俊傑在位」。前兩句話就是物質建設的標準。在封建時代，公侯之國不過地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。那時所謂國，不過等於現在一縣。所以孟子所說的標準，對我們現代的縣政的好壞，也可適用。我們拿這個標準可以衡量一個縣